

第二章 合浦汉墓群的历史发掘与研究

一、合浦汉墓群的历年发掘

历史上，合浦一带的盗墓现象比较严重。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能够较为完整保留下来的汉墓，一般只有相对较难盗掘的土坑墓和木椁墓，而占发掘大多数的砖室墓，超过九成遭到了洗劫，所剩遗物不多。其实，当地民众对于汉墓的认知时间并不长。现存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版、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年）版的《廉州府志》及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合浦县志》均无汉墓发现和出土文物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百姓还把出露的砖室墓称为“直眼佬屋”，相传为小个子、单眼竖直的外来人种所居房屋。1957年4月，广东（1955年5月至1965年6月合浦属广东省辖）考古工作者在杨家岭和廉东钟屋各清理砖室墓1座，两座墓葬结构类似，均南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其中杨家岭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戒指和铁匕首，钟屋墓出土陶盂、陶屋、铁棺钉、五铢和半两铜钱等器物。^[1]自此，考古工作者拉开了合浦汉墓发掘和研究的序幕。截至2013年底，在合浦汉墓分布范围内发掘的古墓已超过1200座，主要发掘地点如图2-1所示。



图 2-1 合浦汉墓的分布范围及主要发掘地点

20世纪70年代，广西考古工作者共开展过3次发掘，其中前两次为配合生产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精美文物，如到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回展览的铜风灯等。

1971年10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对合浦县炮竹厂基建发现的一座位于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大型汉墓进行发掘，当年年底完成。这次发掘的成果令人惊叹，在偏远的合浦居然有如此规模巨大的汉墓和丰富的随葬品，参观群众络绎不绝（图2-2）。首先，这座墓规模大。发掘前，墓上还残存有直径40米、高5米的封土堆，地下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其中甬道两侧带耳室。墓葬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根据朽木灰痕复原确定，这是一座一棺一槨的竖穴木槨墓。其次，出土器物非常丰富。共出土245件随葬品，以铜器居多，其余还有陶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玻璃器和金器等。最后，由于密封和深埋，大部分器物保存完好。封土堆经层层夯打，槨室与墓壁之间的四周填以木炭和红土各15层，相间夯实；槨室板下，依次铺白细沙、木炭和膏泥。有了这一系列密封措施，加之埋藏较深（主室深8.8米），保证了槨室内有相对稳定的埋藏环境，故随葬品除漆器外，基本都得以保存。根据出土的“九真府”款陶提筒以及铜凤灯、金饼、珠饰品等大量精美的器物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晚期位于今越南境内的九真郡太守或高级官员。^[2]在这座编号为M1的墓葬一侧，还发掘了另一座编号为M2的墓葬，出土的遗物也很丰富，虽资料未见发表，但据当年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回忆，两墓位于同一封土堆下，应属同茔异穴合葬墓，即在同一座封土堆下分两穴的夫妻合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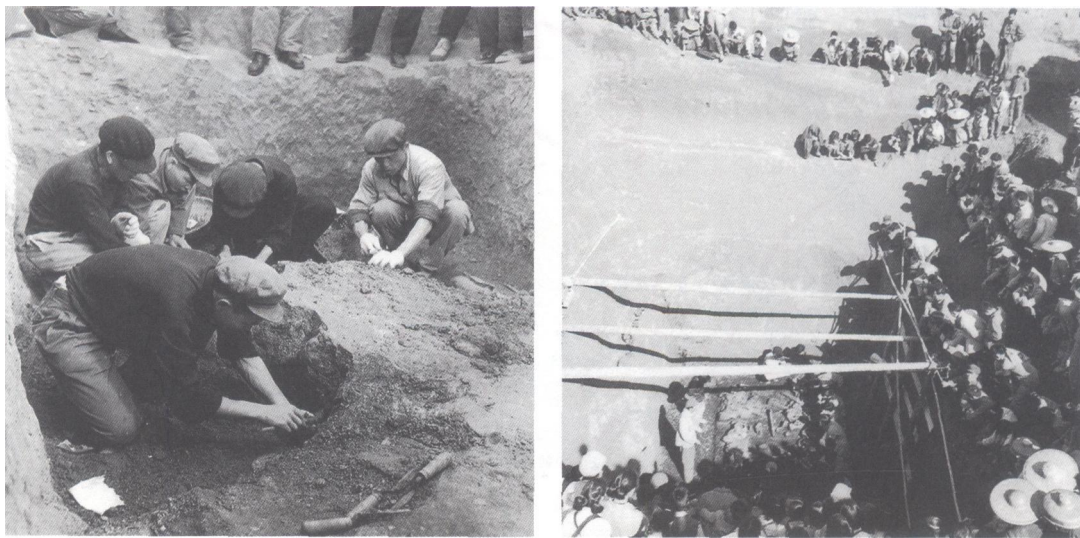


图2-2 望牛岭M1发掘现场

1972年3月，在廉州第二炮竹厂（以下简称二炮厂）第一仓库发掘1座砖室墓。该墓结构复杂，由墓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四部分组成。墓室全长9.12米，前室为横券顶，中室为穹窿顶，后室为直券顶，中室两边还有侧室。出土的陶器有长颈壶、樽、熏炉、钵生莲花器、仓和屋，铜器有梳刷、印章等，年代为东汉晚期。^[3]钵生莲花器后来被认为是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对于论证佛教的海路传入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75年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训练班学员在堂排发掘4座西汉晚期墓，这些墓均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木槨墓。除2号墓外，其余3座均在早年

被盗。2号墓为夫妻异穴合葬墓，随葬品丰富，其中女墓有87件、男墓有143件。这4座墓葬随葬大批兵器和农具，说明汉代对巩固边陲和发展农业生产相当重视；墓内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在广西属首次发现；出土荔枝果壳和果核，见证了岭南名果栽培的历史；出土胡人俑和大量的玻璃、玛瑙、琥珀珠饰，反映了当时对外广泛的交流。^[4]

大量的发掘则是自1984年以来，配合基本建设展开，主要如下：

1985年5~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包括下文提及的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均为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和望牛岭共发掘墓葬13座，出土器物300多件。其中，在风门岭发掘土坑墓3座、砖室墓5座，在望牛岭发掘土坑墓4座、砖室墓1座。在发掘的土坑墓中，4座为同茔异穴合葬墓，随葬器物较丰富，以陶器、铜器为主，另有滑石器和铁器出土。出土的1件铜铎壶，其肩部刻有“西于”二字，“西于”为交趾郡属县，位于今越南首都河内西北。^[5]

1986年4月，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第二麻纺厂发掘古墓10多座，其中东汉晚期10号墓保存较完整，为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这是合浦较早发现的并列双后室墓葬，但和广州汉墓所见双后室的夫妻合葬墓不同，该墓并非合葬墓，东后室为器物室，放置陶器和铜器等大件随葬品；西后室为棺室，主要放置装饰品。该墓出土器物较多，包括制作精美的珠饰和成套的葬玉等。^[6]

1987年3月至1988年5月，为配合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的文昌塔发掘古墓近200座，其中175座的年代为西汉初至东汉时期。^[7]这是合浦汉墓群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首次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和东汉早期、晚期五期墓葬齐备的墓区。较多西汉早、中期墓葬的发现，丰富了合浦汉墓的内涵，为研究合浦汉墓及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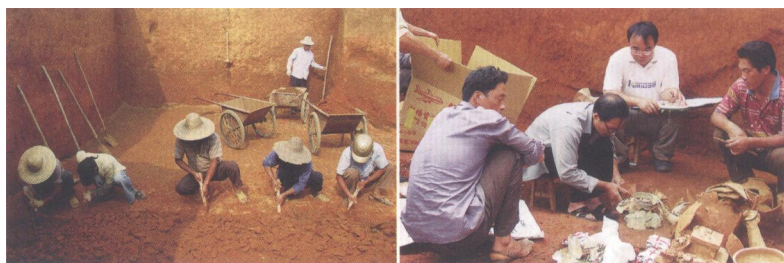
1990~1996年，合浦县博物馆先后在母猪岭抢救性发掘墓葬10座，公开发表了其中5座的发掘资料，包括3座木椁墓、1座砖圹墓和1座直券顶砖室墓，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砖圹墓和直券顶砖室墓的年代均为东汉晚期。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铁器较少。木椁墓和砖圹墓保存完整，除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外，还出土玻璃、琥珀、水晶、玛瑙、绿松石等珠饰，其中以玻璃串珠为最多，完整的就达6234颗。^[8]

2001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九只岭发掘5座东汉墓，有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两类。在砖木合构墓中，5号墓为木椁，仅封门用砖；6A号墓为穹窿顶合砖圹墓。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铜器，还多见金花球、玻璃、琥珀、玛瑙等与海外贸易相关的珠饰。^[9]这次发掘不仅填补了合浦汉墓一些形制上的空白，而且为建立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断代标尺提供了材料。

2003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罗屋村发掘砖室墓6座，这批墓地遭盗扰严重，随葬品多已无存。从形制和残存器物的观察可判断，墓葬年代

应为东汉晚期，部分下限也可能晚至三国时期。其中，3号墓开口两侧发现排列整齐的两列柱洞，两两相对，应为墓上建筑遗存；6号墓位于墓区西边，游离于墓群之外，平面呈长方形，平砖盖顶，墓室长1.75米、宽仅0.3米、高仅0.2米，随葬小陶罐1件，判断墓主应为未成年人。^[10]

2003年底至2005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发掘汉墓8座，包括木椁墓和砖室墓（图2-3）。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金银器、铁器、珠饰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墓葬年代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四期。这批墓葬中有多座保存基本完好，且年代跨度大，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编著了合浦汉墓的第一本专刊《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于200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 发掘现场

2. 提取器物

图 2-3 风门岭 M23A 发掘现场

2008~2009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寮尾墓地发掘古墓32座（图2-4），其中东汉晚期墓7座，三国墓25座。汉墓形制有砖圹墓和砖室墓两类，砖室墓又可分为直券顶墓、横直券顶墓和横直券顶合穹窿顶墓。出土波斯陶壶、铜钹、胡人俑座灯、焊珠金饰片、罗马玻璃、蚀刻玛瑙珠等一批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珍贵文物，波斯陶壶、铜钹和罗马玻璃等更是首次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1]



1. 清理寮尾 M14 墓道夯窝

2. 绘制寮尾 M13B 平剖图

图 2-4 寮尾墓地发掘现场

2009~2013年，为配合各项基建项目的实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杨家山、禁山官塘岭、汽齿厂、二炮厂、廉州乳品厂（以下简称廉乳厂）、精神病院、电厂、迎宾大道、罗屋村、沿海铁路合浦段、中站李屋村、森林公园、南方机械厂、中站庞屋队、火

车站等 15 处地点陆续发掘古墓 157 座，古墓年代跨西汉晚期至晋代。其中，汉墓 62 座，有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三类，主要为砖室墓。出土陶钵生莲花器和卷棚顶陶仓、铅锡合金灶和薏苡仁等一大批重要遗物。^[12]

2012 年 6~9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大浪古城北面、编号为 D2 的土墩墓进行发掘。墩体为一墩多墓结构，共发现 3 座长方形熟土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甑、杯、瓮，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确认土墩墓的存在。之前 2003 年试掘的编号为 D1 的墓，亦应为土墩墓。从器物来判断，年代略晚，为西汉中期。^[13]土墩墓的发现，为复原越人南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阐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华南与东南沿海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实物依据。

此外，合浦汉墓还有不少未公开发表的、重要的发掘资料。合浦县博物馆的藏品显示，1974~1995 年，该馆至少还抢救性发掘了汉墓 88 座，其中包括出土器物较丰富的西汉晚期墓盐堆 1 号墓（1978 年）和东汉早期墓黄泥岗 1 号墓（1990 年）等。从黄泥岗 1 号墓随葬的滑石“徐闻令印”和龟钮“陈褒”铜印判断，墓主应是东汉早期徐闻县令陈褒，这是合浦汉墓中唯一明确墓主身份地位的墓葬。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收藏有历年发掘的墓葬资料，惜未整理发表。

二、以往研究概况



图 2-5 合浦汉墓部分发掘专刊及论著

以往对合浦汉墓的研究多集中在墓葬分期、出土器物和埋葬习俗等方面，多以考古报告和专刊的形式出现（图 2-5），而就合浦汉墓的整体研究尚未展开，目前尚无一本系统、

全面的专著出版。有关合浦汉墓的文化因素分析以及与海外贸易相关出土珠饰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也有待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深入开展。

（一）墓葬分期研究

分期对于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发展演变，埋葬习俗的变迁，是复原当地历史的重要依据。一些与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交流相关的文物，必须置于相对明确的时间节点加以阐述。另外，分期可以更好地补充、证实与信史对应的有关记载，这在历史时期考古中也尤为重要。

岭南汉墓的分期多以广州汉墓为参照。广州汉墓分布集中，年代序列完整，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掘资料的基础上，麦英豪等人根据墓葬形制和主要陶器的演变等划分为五期，其中西汉墓分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两期。^[14] 虽有学者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提出异议^[15]，但就总体而言，广州汉墓的分期体系仍不失为指导岭南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标准。合浦汉墓亦循此例，为与中原及岭北其他地区统一起见，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等五期。^[16]

历年发表及出版的发掘报告大都涉及分期研究。《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 年发掘报告》分析了 8 座汉墓的形制、典型器物组合和演变规律，将其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报告注意到合浦汉墓发展演变的滞后性，力图构建区域的科学分期体系。西汉晚期的木椁墓，除此次发掘保存基本完好的 23 号和 26 号墓外，还参考了合浦其他墓区之前发掘的同时期墓葬资料，但断为西汉中期的墓葬仅 27 号墓 1 座，依据显然不足；九只岭发掘的 5 座东汉墓中，保存完整的 5 号和 6 号墓，典型器物演变明显，因而建立了可靠的东汉早、晚两期的断代标尺；2008~2009 年发掘的寮尾墓地，地处墓葬群的边缘地带，以三国墓居多。这批三国墓，形制和器物与东汉晚期墓存在密切联系，但发展演变仍十分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汉代大一统国家到三国分治的社会变革。此前，有学者注意到东汉晚期墓至三国墓形制的一些变化，但这次大规模的发掘，对系统了解合浦汉墓群的内涵、东汉晚期至三国墓葬的分期演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7]

新近出版的《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收录墓葬 175 座，亦仿《广州汉墓》分为五期。^[18] 其中，断为第一期即西汉早期的 64 座墓葬，年代或可商榷。笔者注意到，其中的 30 座宽坑墓多有横向枕木沟。其中，仅 4 座的随葬器物均为越式器，见罐、联罐和甑；其余 26 座的随葬陶器以罐为主，仅 2 座的为瓮罐组合，器物为越式和汉式共存，大致各占一半，汉式器可见鼎、盒、壶、小碗、釜、带钩、纺轮、铜镜、铁钎等，较窄的坑墓随葬的汉式器数量和种类均有增加，年代也应略晚。较为明显的，如 011 号墓，陶器组合以瓮罐为主，还见陶壶、滑石盘和滑石璧，这种陶器组合以及滑石璧替代玉璧的形式多见于广州西汉中晚期墓葬；又如 113 号墓，该墓带斜坡墓道，随葬陶器亦为瓮罐组合，出土的陶瓮和陶壶

形制在合浦其他墓地的西汉中晚期墓中较常见。因此，笔者认为在第一期的宽坑墓中，至少部分应归入西汉中期。这种汉、越文化杂糅的现象，或许正是合浦置郡县后，汉文化大举进入，进而对本地越人葬俗产生冲击的复杂阶段的反映。此外，由于发掘年代已久，报告中许多墓葬信息缺失，现场照片未发表，砖室墓券顶形状无一描述，也没有做出基本判断；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如后文提及的角轮形环、六棱柱饰、碗、杯等4件玻璃器被遗漏，没有列入报告；与之前发表的许多报告相类似，未使用“木椁墓”这一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形制概念，把木椁墓混同于土坑墓。因此，对《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中墓葬的分期，尚需更多发掘资料来印证。

还有部分报告的分期，由于发掘者的认识不一，结论亦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东汉早期墓与东汉晚期墓、东汉晚期墓与三国墓的分期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凤门岭10号墓的发掘简报中，对陶器做了不恰当的比对，还把出土的大泉五十和货泉当成该墓属东汉早期的证据。之后，有学者更正为东汉晚期。^[19]又如，禁山七星岭发掘9座墓，发掘简报中均断为东汉晚期，但从其出土的铜提梁壶、B型陶灶等器物的型式来看，部分墓葬的年代已晚至三国时期。^[20]此外，五期划分法并非完美无缺。东汉晚期上限以东汉建初初年为界，下限到东汉末年（220年），年代跨度达140多年。一些发掘报告注意到早、晚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笼统提及“东汉中期”^[21]，但由于材料过少，阶段的特征仍无法明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期多着眼于各个发掘墓区，而针对整个合浦汉墓的统一分期，目前尚未确立。随着合浦汉墓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更加重视合浦汉墓的研究。近年来，一些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了合浦汉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多涉及断代分期的内容。^[22]其中，富霞收集140多座合浦历年发掘的汉墓资料，对其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做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本地区统一的、科学的分期标准。

（二）出土器物研究

有关合浦汉墓出土器物，除发掘报告所做的基础研究外，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青铜器等也有不少著述，其余器类则多为旁及。

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尤其是玻璃器，是研究的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家瑶^[23]、史美光^[24]、黄启善^[25]、干福熹^[26]、王俊新^[27]、李青会、王伟昭、熊昭明^[28]、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29]等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对其型式、成分特征和来源等进行探讨。2010年，熊昭明和李青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为主，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开展考古学和科技综合研究，并与国内周边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地中海地区出土的同期玻璃器进行比较，分析其制作技术、成分体系和源流等。他们的初步研究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本地自制，还有部分来自东

南亚以及印度和罗马等地，初步厘清了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源流。^[30]其他研究对象还有铜钹^[31]、波斯陶壶^[32]和金珠饰品^[33]等。熊昭明还对合浦汉墓出土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进行了系统阐述^[34]，这些文物包括玻璃、石榴子石、琥珀、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黄金等饰品以及作为非贸易品的波斯陶壶和铜钹，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除上文提及输入的铜钹外，其他铜器的研究也较多。富霞将合浦出土的汉代青铜器进行系统梳理，还联系海南、徐闻及越南北部等地区的发现，初步分析各类器物的演变规律，总结其地域特点和发展特征。^[35]该文收集的资料较全，只可惜内容略简。熊昭明将合浦汉墓特有的铜井仓灶完整组合与北方地区同期出现的井、灶等进行对比，认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合浦所出的铜井仓灶仿自当地的陶器，为本地制作，推测为临时“订制”。出土铜井仓灶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广西梧州发现的铜屋，很可能从合浦输入。^[36]蒋廷瑜对汉代出土的镌刻花纹铜器从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中心的推断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认为此类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岭南地区尤其是广西东南部，是汉代镌刻花纹铜器的主要产地和制作中心。^[37]文中选取的标本主要出自广西汉代三郡治所的梧州、贵港与合浦，而这三地之中以合浦的最多。不过，赵化成认为，所谓的镌刻花纹多为铸造。^[38]但不管如何，此时青铜器在中原已日渐式微，而在合浦，以镌刻花纹（或铸造细线纹）为主要特征的精美器物的发展却如日中天，显示了合浦作为汉代港口城市繁荣的一面。

其余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印章^[39]、玉器^[40]、灯具^[41]、仿铜陶礼器^[42]、陶屋^[43]、陶井^[44]等也有研究专述或涉及。

（三）葬俗研究

葬俗研究主要涉及合葬墓、外藏椁及架棺葬、碎物葬、厚葬等。这些葬俗虽糅合了多种文化因素，但皆源自本土，反映了作为汉礼中重要内容之一的丧葬制度所固有的稳定性。“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盛行，使得作为奢侈品的珠饰有较大数量出土。

合葬古已有之，汉代是夫妻合葬墓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在合浦已发掘的各个墓区中，均发现有合葬墓。蒋廷瑜认为岭南地区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开始流行，并盛行于西汉晚期。合葬墓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相关，是同坟同穴合葬墓的变体或旁支，虽是一种带地域性的葬式，但并没有形成本地的特殊葬俗，不能把它作为特有的民族习俗来看待。岭南地区自东汉前期起盛行小砖券墓，由于砖比木材坚固耐久，夫妻同穴合葬一般不成问题，同坟异穴合葬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45]林强把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分为同坟异穴和同坟同穴两个类型，认为其演变发展是同时的，但东汉时期同坟异穴合葬墓已明显减少；还认为岭南地区的合葬墓具有本地特点，在形制和发展演变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明显的差异。^[46]合葬墓的葬俗源自中原，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墓与以前一样，仍采取异穴合葬

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已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穴合葬。^[47]合浦的合葬墓以异穴合葬为常见，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并未消失，依然盛行。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风门岭24号墓、寮尾13号墓、九只岭4号墓和6号墓、二炮厂14号墓等墓葬均属这种类型。笔者认为，异穴合葬墓的长期流行是由于合浦地处偏远、葬俗演变滞后所致，而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的关系并不大。

合浦汉墓中，有少量带外藏椁。广西汉墓的外藏椁制度在西汉早期由中原地区传入时，尚保存真人殉葬的习俗，到西汉中、晚期确立“厨、廐之属”的内涵，再到东汉早期的衰落，与中原地区发展基本同步，但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区域特征。^[48]合浦发现6座西汉晚期的带外藏椁墓葬，其中堂排2B号墓、凸鬼岭6号墓、堂排4号墓和望牛岭1号墓为耳室形，风门岭26号墓和另一座1985年发掘于合浦炮竹厂的木椁墓，其外藏椁置于墓道底端。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为郡守级的官吏或权贵阶层，也可能是南下的汉人。广州汉墓中，未见合浦出现的外藏椁形式，反映了两广汉墓之间的历史分野。^[49]

汉代合浦盛行厚葬之风。林强将广西汉代厚葬分为西汉和东汉两大时期，西汉时期有大型棺椁墓和中型墓两种厚葬方式，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采用；东汉时期则多为中型砖室墓，随葬品明显减少，认为厚葬习俗的产生主要有精神信仰、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50]事实上，厚葬之风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统治阶级、贵族，合浦的许多中小型汉墓无论是构筑用工用材，还是随葬器物，相对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言，亦入厚葬之列。厚葬之风在汉代社会普遍盛行，富者奢靡僭越，一般百姓穷尽财产，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殫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以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后汉书·赵咨传》卷三十九）。

关于合浦汉墓的一些其他葬俗，也有学者注意到。岭南汉墓中开口常见的柱洞，郑君雷按性质和功用将其划分为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墓上表木与墓上建筑等七类，认为文昌塔6号墓和8号墓在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柱洞应为甬道门柱，而文昌塔5号墓和罗屋村3号墓墓口的柱洞似与筑墓时搭建的临时建筑有关。^[51]岭南的战国秦汉墓还出现架棺葬俗，合浦母猪岭4号墓应属此类，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52]此外，合浦汉墓中还发现了碎物葬，其中汽齿厂9号墓和11号墓随葬的部分器物残块，分置几处，而且相距甚远，应为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二炮厂4号墓出土1面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碎物葬早在中原的史前墓葬出现，在商周至秦汉时期在越族地区仍较普遍，在商周时期的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广东博罗横岭山以及桂平大塘城、贺州凤凰岭汉墓均有发现。富霞认为，墓主为汉化越人的可能性较大。^[53]

（四）其他研究

墓葬形制方面，与域外因素有关的叠涩穹窿顶，其源流受到了关注。笔者结合相关研究指

出，东汉晚期流行于合浦乃至岭南一带的叠涩穹窿顶墓，其构筑方法受到了中亚地区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影响。^[54]

彭长林^[55]、邓家倍^[56]、王元林^[57]、覃主元^[58]等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汉代合浦港的作用及重要地位，一些讨论述及合浦港现今的大致方位。在开展合浦港考古工作十多年后，熊昭明曾对合浦港阶段性考古进展予以介绍。^[59]此外，2004年召开“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结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课题组及司徒尚纪、黄铮、吴三保、廖国一、丘立诚、黄启善、傅举有、程存洁、李富强等学者的有关论文^[60]；2016年10月，北海举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100多篇。上述论文，不少基于合浦汉墓的出土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有学者从近代地方史志出发，错误析读大浪汉城址等发掘资料，其中有关合浦港址的结论，可信度极低。^[61]

部分学者还从汉墓资料出发，试图对合浦乃至岭南的秦汉社会做初步复原。对于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过程，郑君雷认为，岭南汉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汉越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其优势地

位是在西汉中、晚期确立，表现为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汉墓和岭北汉墓的发展轨迹已经趋同，鲜见越式因素，但地方特点仍然突出，可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62]富霞、熊昭明着眼于合浦发现的土墩墓，结合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和越南北部的发现，论述史载从先秦时期开始、沿东南沿海的“越人南迁”路线的真实存在，说明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通过海路的密切联系已经存在。^[63]蒋廷瑜就考古发现的铁质农具、种子、农副产品以及相关的陶仓模型明器等，对包括合浦在内的广西汉代农业概况做了概括。^[64]冼剑民从岭南地区的视角上，论述农业、青铜业和冶铁业、商业萌芽等内容。^[65]吕名中对岭南的经济发展及特色亦做了探讨。^[66]

- [1]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139-148页。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 [5] 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第190-191页。
- [6]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7]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 [8] 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墓葬发掘报告》,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5,第313-323页。
- [1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至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1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
- [1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15] 李龙章在《南越国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序列》(《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00-112页)一文中认为,《广州汉墓》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及分期与实际有较大出入,应予修正。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482-491页。
- [17] 韦革:《浅谈合浦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墓形制的一些变化——从合浦岭脚村三国墓说起》,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第528-534页。
- [18]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117-118页。
- [20] 熊昭明:《广西汉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第60-71页。
-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22] 谭玉华:《合浦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3;蒙长旺:《广西合浦两汉六朝墓葬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23]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24] 史美光、何欧里、周福征:《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3期。
- [25] 黄启善:《广西汉代玻璃制品初探》,载干福熹主编《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第75-81页;《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
- [26] 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Z1期;干福熹:《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硅酸盐学报》2004年第2期;《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第5期。
- [27] 王俊新、李平、张翼、彭子成:《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核技术》1994年第8期。

- [28] Qinghui Li, Weizhao Wang, Zhaoming Xiong, Fuxi Gan & Huansheng Cheng, 2009. PIXE study on the ancient glasses of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Hepu county, Guangxi. In book: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Gan Fuxi, R.H. Brill & Shouyun Tia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397-412. 王伟昭、熊昭明、李青会、干福熹:《广西合浦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检测和研究》,载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205-215页。
- [29] 碧姬·博雷尔:《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7-44页。
- [30]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 [31]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第327-331页。
- [32]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33] 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49-163页;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34] Xiong Zhaoming,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iquity* 88, No. 342 (2014): 1229-1243;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
- [35] 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372-402页。
- [36]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载香港历史博物馆编《瓯骆汉风》,2014,第26-33页。
- [37]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38] 2016年10月在北海“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岭南双绝:汉代细线纹铜器与漆绘铜器”发言的内容。
- [39] 黄展岳:《“朱庐执刼”印与“劳邑执刼”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蒋廷瑜:《“劳邑执刼”琥珀印章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 [40] 熊昭明、谢日万:《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541-551页。
- [41]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谢广维:《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马座灯辨识》,载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3,第346-350页。
- [42] 朱海仁:《岭南汉墓出土仿铜陶礼器的考察》,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13-21页。
- [43]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石拓、程建军:《汉代陶屋所反映的岭南民居的变迁——试论“三间两廊”的形成》,《建筑师》2013年第3期。
- [44] 李世佳:《广西汉墓出土陶井明器初探》,《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 [45]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46] 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4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390页。
- [48] 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5,第506-517页。
- [49]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载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第284-289页。
- [50] 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51]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52]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53] 富霞:《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 [54]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第145页。
- [55] 彭长林:《试论汉代合浦港的兴衰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载潘琦主编《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519-542页。
- [56] 邓家倍:《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57]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 [58] 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 [59]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的新进展》,载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第130-140页。
- [60] 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
- [61] 陆露、张居英:《西汉合浦港口考辨》,《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 [62]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63]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64]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65] 冼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49-54页;《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
- [66] 吕名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